

自然意象、民俗符号与命运图谱——论《日光流年》姓名符号的分类与隐喻

■ 梁静宜

在中国当代文学谱系中,《日光流年》以其独特的隐喻系统构成重要的阐释空间。作家阎连科将人物姓名与其性格特质、生存境遇形成象征性关联,使普通称谓语转化为承载隐喻的符号。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该书的倒退式叙事模式、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的苦难诗学建构及疾病隐喻等维度,针对其姓名符号系统的研究仍显不足。本文拟聚焦小说中的姓名隐喻现象,借助中国传统物象理论对文本的姓名符号进行归纳分类并阐明根源,进而分析姓名编码中的自然意象、民俗符号及其共同体现的人物悲剧命运,以此对《日光流年》的姓名符号进行系统性解码,丰富对《日光流年》的隐喻研究。

一、姓名符号的划分与命运底色

本文以类型学方法为研究路径,对阎连科《日光流年》的人物命名体系展开系统性考察。通过文本细读与三次交叉校验,考释并确认具名人物 63 例(含核心角色、次要配角与单次出现的功能性配角),其命名策略共呈现七大符号类型:植物、动物、地理景观、数字象征、工具器物、身体特征、吉祥符号。基于中国传统物象与类型学方法、语文学理论,本板块拟在揭示各类命名范式个体逻辑与共同特征的同时,着重探讨其类型划分的学理依据与姓名符号系统的建构逻辑。

(一)植物

植物符号在乡土中国的命名传统中兼具自然属性与文化隐喻的双重维度。例如,作为农耕文明的物质根基,“五谷”“桑麻”等植物意象既指向实际生存需求,又通过“社稷”信仰与乡土伦理形成符号关联;儒家“比德”传统将植物特性人格化(如梅喻坚韧、竹喻气节),赋予植物情感承载功能(如“桑梓”代故土、“折柳”寄离思)。《日光流年》的植物符号名正激活了植物在农耕文明中从“自然”到“文化”的隐喻系统,包括司马桃花、司马森、司马林、司马木、司马藤、司马葛、司马葱、司马翰、司马叶、杜桑、杜根、杜梅、杜梅梅、杜柏、杜竹翠、杜杏花、杜梨花、杜铁树、杜椿、杜青叶、杜大桃、蓝杨根、蓝柳树、蓝叶儿、蓝四草、蓝五草共 27 例。以下将逐一论述其分类的学理依据与“命名—命运”的隐喻逻辑。

1.司马桃花

作为中国传统植物意象的典型代表,肇始于《诗经·桃夭》的“桃花”意象在后世逐渐具备双重文化维度:一方面作为迎春婚配时令的植物表征,承载着青春美人、两性情欲的隐喻功能;另一方面,因花期与清明雨汛的物候同步性,“人面桃花”“桃花一流水”的文学母题建构了时光易逝、青春难驻、美好易逝的审美追忆。植物代谢周期暗示的生命意识,与仲春时节蕴含的情欲象征,共同构成桃花意象的内在张力。《日光流年》中,年华不再的惋惜、情欲的隐喻正与司马桃花本人的命运遭际形成了强烈互文:她代表三姓村前任侍奉卢主任及其病妻,身着新红袄时“如一团跳满在山梁上的火球”“是伶仃伶俐的一个”,因此获得了卢主任的“青睞”。奈何“脱了那袄,苍老无所顾忌地冲在她的脸上”,司马桃花不久便因“年老色衰”,遭卢主任抛弃,同步实现与结束了“献身”悲剧。

2.司马森、司马林、司马木

《说文解字注》形义训释:“森,木多兇。从林从木,平有从木曰林,从二木。凡林之属皆从林。”“木,冒也。冒地而生。东方主仁,从草,下象其根。”首先,“森”“林”“木”具备语义场的同源关联,与司马三兄弟的生理共性形成隐喻的互文——暗示着兄弟间的侏儒缺陷;其次,“木多兇”的“集群”义与从复合“森”到单体“木”的结构递减,隐喻了三兄弟的集体宿命——从“森”到“木”,从繁盛走向死亡的命运滑坡:同为司马笑笑之子,侏儒三兄弟均在饥荒中被遗弃,被乌鸦啄食致死。《日光流年》通过文字符号形成递减关系的超故事层的命名策略,以符号系统的群体结构隐喻了侏儒三兄弟的集体悲剧。

3.司马藤、司马葱、司马葛

司马三姐妹的命名延续了上述的群体性命名策略。顾野王《玉篇》:“达曾切,藟也。今总呼蔓延如藟者。”《说文解字注》:“藟,絺綌也。从艸,曷聲。”“蔓,蔓属也。”“藤—藟—葛”共属蔓生植物语义场域,其命名逻辑与“森—林—木”形成互文。此类植物因天然“缠缚”的生态特征成为性别隐喻的载体——正如《诗经》“葛藟荒穰”的婚媾意象,蔓生植物与乔木的共生关系被转换为传统婚嫁制度中的性别从属结构。司马三姐妹的命名因此包含三重渊源:表层体现蔓生植物在农耕社会的常见性,中层体现传统农耕社会对女性婚育、生命繁盛的朴素寄愿,深层则超故事层地揭示了三姓村封闭环境中女性的结构性困境——其生存如同藤蔓依附于宗法制度之“树”,生命消溶于“婚嫁—生育—劳作—死亡”的“献祭”的循环链条。而她们的献祭与牺牲,换来的不过是在传统伦理中被男性以“藤—藟—葛”之属名。在此,姓名符号再次将个体命运编码为传统村落女性的集体悲剧。

4.杜桑、杜柏

桑、柏祖孙的命名构成以乔木为核心的象征系统。杜桑的姓名符号依托桑树构建了三重文化隐喻:其一,早在先秦,即存在“桑林会男女”的春社之俗。《酈风·桑中》即为这一世风的明确佐证。“这‘桑中’,我以为即卫地的‘桑林之社’……‘社’为地神之称,但后来也变成聚会的场所,在高禖的祭祀相混……总之,桑林之社也是男女聚会的地方。”在此基础上,桑林逐渐演变成一种性暗喻,成为情色的象征,如“桑中之喜”指代男女情色。桑树在上古时期即被赋予的两性隐喻、情色意涵与生殖崇拜意义,恰与杜桑选择成为妇产科的“赤脚大夫”,在弥留时勒令三姓村夫妻加紧房事、组织繁行的“生育运动”构成呼应;其二,《小雅·小弁》“维桑与梓”所构建的乡土情结,贯穿于杜桑为降低三姓村难产率而外出学医的“离乡—归乡”的人生轨迹,隐喻了杜桑终生奉献故土的“埋骨桑梓”的选择;其三,如《虞主用桑》,《中华大字典》载“桑,犹丧也”,桑、丧的同音属性使象征生殖的“桑”拥有另一重“死亡”意涵,恰恰与三姓村的死亡观形成符号对接。“让这些孩娃们练练胆,让他们知道三姓村人死得早,知道人死就是没有气儿了,没有啥儿值得害怕的”——杜桑死后,其尸停灵月余并由各家小孩轮流守夜,这场具象化展演的死亡仪式转化为三姓村生死启蒙

的教育实践,揭示了三姓村在短寿宿命中凝聚而成的死亡观:人死不过“植物凋零”。

杜柏的命名则遵循松柏类植物的双重象征维度:“受命于地,唯松柏独也正,在冬夏青青”,柏树生命的永恒性对应三姓村人对长寿的强烈诉求。杜柏时时手握《黄帝内经》阅读并每天煎熬熬煮寿汤,正是其生存焦虑的具象化;“她死了,我们得活着”“死了哭不活呢”,司马蓝在四十岁撒手人寰,也是杜柏“领着村人埋葬了儿子杜流、司马弟兄、蓝四十及别的大七村人”,杜柏的死亡态度是“逝者已矣,生者如斯”的现实主义。结构上,全文以杜柏“啷啷一下明白”的顿悟了结了三姓村三代人的生死鏖战——“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当“凛冬”降临(耗尽全村人力、物力的“灵渠引水延寿工程”失败),杜柏以幸存者的悖论姿态成为叙事空间中的“后凋者”。他既是三姓村延寿历史的清醒见证人,又是不得不延续荒诞生存的在场者;既是抽离于集体迷狂的观察主体,又是被永困在废墟现场的客体。杜柏恰似寒风中的松柏剪影,怀揣着现实主义的死亡观永恒定格在对消逝者的凝视与对宿命的对抗之中。

5.杜菊、杜梅梅、杜竹翠

杜家三位女性——杜菊、杜梅梅、杜竹翠的姓名符号与人物特质形成双重悖反:其命名符号取自“四君子”,其行为轨迹却颠覆了原型的道德预设,俨然属于超故事层的隐喻范畴。

杜菊为司马笑笑之妻,杜梅梅为蓝百岁之妻,而司马笑笑与杜梅梅、杜菊与蓝百岁各有私情,不合于传统道德的私通情节构成了对传统意象的颠覆。“莫嫌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花晚节香”,菊花以“晚节香”为道德象征,杜菊与蓝百岁的私情则构成对“菊”符号的道德性消解(三十余岁亦确属三姓村的“晚年”);而杜菊最终因负罪感自缢的结局,却又以极端方式回归“宁可枝头抱香死”的传统训诫。符号的撕裂与缝合,映射出三姓村伦理体系中道德规训的困境——生存压力既能瓦解符号的原始意义,亦可能催生更极端的符号重构。

杜梅梅的命名亦构成对“梅”的符号解构。在传统意象体系中,梅花以“琼英缀雪”的高洁形象承载文人精神,但《金瓶梅》通过虎春梅的形象完成了符号异化:化“寒”梅为“春”梅。虎春梅作为西门庆家的通房丫头,其姓名中的梅花意象与情欲叙事紧密捆绑。杜梅梅的命名正延续此变异逻辑,从原始本能碾压道德桎梏,传统符号承载着反常规的生存策略——“梅”字承载的霜雪精神,最终沦为乡土女性在宗法制度缝隙中求生存己的本能写照。

“群居不倚,独立不惧”,竹以气节著称,其坚可配松柏,劲可凌霄霜,杜竹翠的命名因此更具辩证性。她执着于与司马蓝结婚,不惜多次阻断司马蓝与蓝四十的爱情,化身面目狰狞的“恶女人”。这种一意孤行的“纠缠”既消解了竹的文人氣质与道德象征,又在波谲云诡之中呈现出原始野性的生命力,以山野村妇的粗犷方式重构了竹的“坚韧”内核。人物塑造中波谲与刚强并存的矛盾性形成独特的精神空间:当传统文人的“气节”符号下沉至乡土社会,其精神内核被置换为生存层面的原始韧性。这种符号转译既是对精英文化的祛魅,也是对底层女性生命力的另类书写。然而,在另一个维度上,杜竹翠与“不倚”的竹大相径庭:“你要是耍了我,我会像磨道里的驴一样侍奉你一辈子”,杜竹翠合乎阎连科笔下的“贤妻”标准。她为婚姻付出了沉重代价,为司马蓝生子、做飯、日复一日地操劳,并目睹着司马蓝一次次赴往蓝四十家,践踏着她作为妻子的身份和尊严。杜竹翠将自己的精神、肉体依附于男性,在无望的婚姻中下沉。“男人是她们生命的一切,并且主宰着她们的一切,她们自我的丧失使其只能依附别人,成为没有独立人格的人”,她富有韧性而缺乏精神的独立性,杜竹翠的生命力是“藤葛之属”的生命力,而非竹之生命力。

6.杜根、蓝杨根、蓝柳树

三人的命名聚焦于植物根系符号的隐喻。杜“根”无具体植物指向,而“杨”“柳”分属深根系植物与直根系植物,根系均深入土壤,主根扎得深,须根分布广。根系作为植物生命系统的能量中枢,其自然形态在农耕文明认知中承载着双重象征维度:“深根固抵”的“深埋性”、“根布四通、密接土气”的“延展性”,而均暗合宗族繁衍的空间想象。饥荒中,杜根为保全儿子杜杜性命的,忍痛弃子以求他人收养,最终与子分食亡女遗骸;杨根、柳根的出场则必然与其亲属同现,其人物形象的刻画在几次集体卖皮中集中展现,这无不强调着三人的宗族性。“根系”的命名策略借助植物器官的微观特写,将农耕文明“落地生根”的生存伦理编码为具象符号;“根”是生理维度的生命保障与精神维度的文化锚点,展现出三姓村人集体无意识中扎根大地的深厚乡土情怀、家族繁荣的朴素盼望与长寿坚韧的生命追求。

7.“命名—命运”之关联不可考

除具备充分阐释基础的植物意象符号,尚存在一类特殊案例:司马翰、司马叶、杜杏花、杜梨花、杜铁树、杜楠、杜青叶、杜大桃、蓝菊、蓝叶儿、蓝四草、蓝五草共 12 例姓名符号虽具备可考的符号学价值,但因人物叙事维度的缺失形成阐释困境。植物意象本身承载着传统文化谱系中的既定象征意义(如“榆”寓富貴长生,“杏”寓美好纯洁,“叶”“草”“果”实三类具体物象可延伸出“生命力旺盛”“繁衍生息”的象征意涵等),但由于文本未提供足够的行为轨迹与性格刻画,导致符号能指(植物意象)与人物所指(角色特质)间无法建立有效的符号学关联。这种叙事留白使笔者难以判断此类姓名究竟构成作者刻意的隐喻编码,抑或仅为乡土命名“所见即所得”的自然采撷,因此悬置。

(二)动物

《日光流年》中以动物指称的姓名符号包括司马虎、司马鹿,蓝大豹、蓝二豹、杜狗狗共 5 例。此类动物符号系统通过命名策略实现人物性格的直观隐喻:

杜柏从屋里冲出来,一脚把妹妹(杜竹翠)从大门里踢到大门外。拿了菜刀举在半空的司马虎在杜柏身后被五哥司马虎紧紧抱住了。

当杜竹翠与司马蓝爆发矛盾,司马虎“举刀欲砍”的激烈反应与司马鹿“抱阻劝解”的温和应对,构成“虎—鹿”符号的戏剧化对照。虎作为

山君,素为虎啸山林、震慑百兽的威权符号;《周易·乾》的“风从虎”昭示其与天地之力的共振,汉代虎符亦将虎的猛厉转化为权力符码;文学作品中冠以“虎”名的人物,无不彪悍强势,这与司马虎大胆敢拼、雷厉风行、勇猛刚强以致冲动暴力的个性形成直接对照。而鹿在自然生态中向来处于猎物地位,作为“呦呦鹿鸣,食野之苹”的柔善象征,往象征温暖、柔和,司马鹿则确实温和谨慎、柔和善良乃至怯懦胆小、瞻前顾后,充分彰显了动物意象与人性特质的符号同构。

同时,在开渠延寿工程的叙事中,“虎—鹿”所指涉的性格特质与个体命运图谱的互涉性得以具象化呈现。麦尽腿上的皮子,目睹延寿计划再次失败与司马蓝的死亡,司马虎以决绝的自缢践行其刚烈秉性,构成具有仪式感的生命终结;而司马鹿的死亡则隐没于“修灵隐巢”这一集体劳动叙事的褶皱中,其生命轨迹的消逝甚至未获阎连科的正面书写,仅在司马蓝“昨天最后一炮炸住了他”的口头解释中得以交代。“虎—鹿”二者殊异的死亡图景,恰构成姓名符号、性格特质与命运图谱的三重镜像式对照。

“蓝家的傻子”蓝大豹、蓝二豹与“杜姓的痴狗儿”杜狗狗的命名则昭示了乡土社会为智力缺陷者“求生”的截然相反的命名策略。“傻子”的命名系统呈现“豹—狗”的悖论:豹为迅猛猛兽,其凶悍意象却被村人用于纾解“命格轻贱”的先天残缺,暗含“以凶制厄”的乡土朴素思维;狗作为“五畜之卑”,其命名则遵循“贱名易养”的民间反语习俗,以符号贬抑祈求生命存续。这种双重策略实质是农耕文明在认知局限中发明的缓冲机制:将现实苦难转化为可控符号,为不可控的生存现实建立应对路径,在象征层完成对残酷现实的驯化与消解。

(三)地理景观

因人物叙事维度的匮乏,《日光流年》中以自然景观命名的姓名符号基本属于故事层自洽的意义系统(除“杜流”),缺乏对人物命运的隐喻。这类姓名符号包括司马南山、司马山脉、司马洪、杜流、杜壮、杜岩、蓝石头共 7 例,集中于“石”“水”两类。其中,司马南山、司马山脉、杜岩、蓝石头 4 例属“石”,司马洪、杜流、杜壮 3 例属“水”。

1.石

“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日光流年》中的岩石命名系统承载着农耕文明对永恒生命的想象。岩石具备自然属性上的坚固性、长寿性、稳定性与抗摧折性——被建构为“天地至坚”“天地之寿”的具象,后人亦多取石之贞固正守、孤拔千仞、耿介不污与长寿永恒的品质以命名而自喻。结合三姓村突出的“短寿”矛盾进行考察,以“南山”“山脉”“岩”“石头”为名,强烈彰显出三姓村人对“磐石不移”之德行的期许与“寿比南山、山石”的长寿愿景。

2.水

与“石”相同,“水”亦有“夫水者,君子比德焉”的“似德,似仁,似义,似智,似勇,似察,似包,似善化,似正,似度,似意”的“十一似”的道德寄托,象征着清静与纯净。但与“无转移”的石性相比,“水”意象截然相反地代表着流动与变化,以“不舍昼夜”成为时间永恒、生命永恒的隐喻。威尔赖特说:“这个原型性象征,其普遍来自于它的复合的特性:水既是洁净的媒介,又是生命的维持者。而流水既象征着纯净,又象征着新生命。”“洪”“流”“水”的姓名符号承载着“上善若水”的道德伦理期许,又暗合“水为万物本原”的生命原初想象与永恒期盼。

其中,杜流的命运轨迹构成水符号的终极演绎。作为灵隐渠引水员,其名“流”本指向水利工程承载的三姓村的延寿希望;但他亲眼目睹灵隐渠污水横流、三姓村延寿计划再度破灭,“投水而亡”的自杀选择将“水”推向解构——生命之源异化为死亡之结局。更具反讽意味的是,其尸身随水流归故里的结局,以黑色幽默的方式完成“水流”符号的闭环叙事,水的流动性既维系了肉身的空间位移,又消解了生命的存在意志。

(四)数字编码

数字命名系统以蓝氏家族最为典型:包括蓝百岁、蓝九十、蓝八十、蓝七十、蓝六十、蓝五十、蓝四十、蓝三十共 8 例,以纯粹的寿数为内容,并不像“蓝四草、蓝五草”等在纯粹数字以外仍包含其他意象成分,因此构成直白的数字符号。此类命名属于故事层自洽的意义系统,与命运图谱的勾连属于集体性的寿命焦虑(而非个人的具体命运),并遵循双重功能:一是以数字标记家族成员的长幼排行,二是通过数值直观表达对寿命的祈求。

然而,随着蓝家子嗣繁衍,其命名数字被迫向现实生存阈值收缩:当“四十”“三九”的数值迫近三姓村人寿命的客观极限,其命名行为已从传统祈祷(“百岁”“九十”等寄寓理想长寿)异化为现实标注(“四十”“三九”对应生命大限)。即便如此,“四十”作为命名终点仍具备集体性的象征功能,既是三姓村对“活过四十岁”这一生存目标的符号化宣言,也是三姓村对宿命枷锁的沉默抗争。数字符号命名由此升华为三姓村乡土群体在死亡阴影下倔强求生的精神图腾——即便四十载是三姓村人生命的极限,也要在姓名中为这份微薄的“长寿”预留象征空间。

(五)工具器物

《日光流年》中的工具命名集中呈现了农耕文明的实用主义,其构成包括蓝长根、蓝长杠、杜柱、杜柱共 4 例。蓝长根、蓝长杠的命名直接挪用工具,虽因角色边缘性缺乏阐释空间,但其符号选择仍折射出乡土社会“物以致用”的命名逻辑——以生产工具命名子嗣,暗含对劳动价值的主观性确认。

杜柱、杜柱的命名则展现了更深层的符号转译机制。“柱”与“柱”作为土木工程的核心元素,其命名实践构成三重语义转换:其一,物理维度上,以建筑结构的稳定性隐喻家族血脉的延续性;其二,伦理维度上,将工程承重转化为个体对家族责任的担当;其三,社会维度上,通过刚性材料的抗压特质暗喻抵御外部危机的集体韧性。这种从物理承重到精神支撑的符号转换,本质是乡土社会升华生活日常的具象体现——以工具符号为维系伦理秩序的精神铆钉。

其中,杜柱因卖皮被赖账而自缢,却又因此吓得医院手忙脚乱,最终由县水利局负责人出面为卖皮一行人提供了大量建筑材料。在修渠一事上,杜柱的死亡无疑奠定开凿地达成了“柱”

式的支撑作用,由此完成“命名—命运”的隐喻。

(六)身体特征

《日光流年》的姓名系统中,“蓝骷髅”为身体特征型命名的孤例,呈现出直白性表征。其命名逻辑遵循乡土社会常见的“以形赋名”传统,通过生理缺陷的直接外化完成身份标识。相较于其他符号的隐喻深度,此类命名因语义透明性与角色边缘性(蓝骷髅仅出场一次)未构成深层符号学阐释空间。

(七)吉祥符号

“吉祥语”是表达美好、福善意愿的言辞,当其在人物姓名中出现,则表现为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待。《日光流年》高频出现的吉祥语命名,集中体现了乡土社会对生存愿景的符号化表达。

此类姓名通过语言符号的祝祷传递集体诉求,具体呈现出三重编码模式:其一,显性诉求型命名,以直白语义传递生存诉求,将现实焦虑转化为字面化的生命祈愿;其二,比喻修辞型命名,借助象征符号实现愿望转译,通过语义置换构建间接表达路径;其三,隐喻修辞型命名,依托抽象概念将人物命运投射扩展至多义性符号场域。这三类命名共同构成乡土社会“以名载愿”的文化实践,通过符号系统的建构与重组,在语言层面实现对生存困境的象征性消解。

1.显性诉求:生存焦虑的符号化

显性诉求型命名系统集中体现了乡土社会“以祈祈应”的符号实践逻辑,未构建复杂的隐喻体系,植根于乡土命名传统中的直陈原则,属于故事层自洽的意义系统,其构成包括司马红、杜高寿、杜百年、杜不老,蓝长寿、蓝香香共 6 例。

“红”“香香”符合民间女性命名的审美范式,通过视觉(色彩)与嗅觉(芳香)的感官符号,将意义寄托锚定于青春范畴;“高寿”“百年”“不落”“长寿”则遵循直陈性原则,通过字面语义与所指对象(长寿愿望)的直接对应,构建零度修辞的符号关联。此类命名既是愿望载体,亦暴露了三姓村生存焦虑对命名系统的深度渗透。

2.比喻修辞:吉祥观念的符号替代

比喻修辞型命名系统通过喻体符号建构愿望表达的间接路径,同属故事层自洽的意义系统,包括司马龟庆、司马龟龟、司马龟祥、司马龟吉、司马常青、司马珠共 6 例。此类命名以“龟”为核心构成典型范例(以“龟”人名,佐以“吉祥、庆典”字样的姓名占 4 例),依托传统文化中龟作为“麟、凤、龟、龙”四灵之一的长寿象征,将生物特性转化为寿命延展的明确载体;“常青”同理,借用部分植物终年不调的自然属性,抽象投射出青春永驻、健康长寿的生命理想;“珠”则通过“掌上明珠”“如珠似宝”的民间譬喻,将珍宝意象转译为对女性价值的珍视、取珍惜疼爱之意。

这种比喻策略与显性诉求型命名的本质差异在于符号能指的选择:前者通过喻体(龟、珠、常青等)构建与所指对象(长寿、珍视、永恒)的间接关联,后者则以直陈语义(寿、康等)实现能指与所指的直接对应。

3.隐喻修辞:人物命运的多维投射

隐喻修辞型命名系统通过姓符号建构起复杂的阐释空间,属于超故事层的意义系统,包括司马马仁、司马笑笑、司马蓝共 3 例。司马马仁的姓名符号与其命运轨迹深度互文:作为司马蓝的曾祖父,三姓村首位发现“喉堵症”并试图图举村迁徙的失败者,其名“马仁”与“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哲学命题构成尖锐反差:当村民将生存希望寄托于天道的仁慈时,其抗争的溃败恰成为命运无情的实证,姓名符号在此成为现实困境的终极反映。

司马蓝之父,司马笑笑的命名隐喻最为错综。一方面,在带领村民对抗“喉堵症”的失败抗争中,司马笑笑的人物定位实符合乎《出埃及记》中摩西的救世者形象——如同摩西“可以远远观耶和華賜给百姓的流奶与蜜的迦南那地,却不得进去”,司马笑笑最终亦以“救世主”姿态困于“必死在你所登的山上,归你列祖去”的宿命枷锁;他的救世努力悉数失败,“笑”的积极语义蜕变为对荒诞宿命的反讽,成为命运嘲弄的具象化印记。然而,另一方面,其名“笑”的语义恰恰指向对苦难的消解,司马笑笑在饥荒中“以‘潇洒’姿态舍身饲鸦,换取口粮供养村民的慷慨赴死,赋予了‘笑’名以具备‘在上为鸟鸾食,在下为螻蚁食’性质的壮烈的英雄主义内核,亦近于《庄子》‘鼓盆而歌’的生死超脱”。

司马蓝的姓名系统亦具备多层编码,但其内涵指向简明:其一,作为寄托家族生育盼望的符号存在(借“蓝”家“女姓子”求嗣);其二,“蓝”字实由蓝氏家杜梅梅命名,“蓝”作为婚外情产物成为宗法伦理越界的隐秘标记;其三,作为联结符号“司马”“蓝”两大家族的枢纽符号,其名影射了司马蓝其与蓝家的深刻羁绊,包括他与蓝四十的爱情悲剧。这种三种一体的符号结构,通过单一能指串联起宗族子嗣、伦理禁忌与情感宿命的多重命题,最终将司马蓝的个体命运化作乡土社会结构性困境的微观缩影。

二、姓名符号的三重语义场

通过对《日光流年》姓名符号系统的综合考察,本文依据文化属性将其命名范式划分为两大核心范畴:植物、动物及地理景观构成的“自然意象类命名”,数字编码、工具器物、身体特征及吉祥符号组成的“民俗符号类命名”。这两类符号系统在文本中呈现出深刻的辩证关系——前者以农耕文明亲近自然、崇拜自然的属性为根基,通过物象象征投射对生命的生存伦理;后者则以民间实用主义为导向,将生存焦虑编码为符号化的象征与祝祷策略。二者共同构成了三姓村乡土社会的认知基质,既承载着宗法制度下的伦理秩序,又折射出生命在死亡宿命前的符号化抗争。

值得注意的是,两类符号系统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人物的命运图谱形成结构性互涉:自然意象的代谢规律暗合个体、集体生命的盛衰轨迹,民俗符号的愿望投射同样映射对人生悲剧与三姓村集体困境。由此,自然意象、民俗符号与命运图谱共同构建起乡土社会的三重语义场域——前者为表意基础,中者为策略延伸,后者为二者共同的终极指向。这一复合阐释框架通过符号能指与命运所指的深度绑定,为小说中 63 例姓名符号的系统解码提供了理论路径。

(一)自然之镜:农耕文明的认知体系

自然意象类命名的本质,是乡土社会对自然秩序的符号化摹写。回归故事层而言,自然意

象类命名则是乡土社会对自然崇拜的延续,是乡土认知体系的微观缩影:农耕文明的生存逻辑以“农本”为核心,自然物不仅是物质依赖的对象,更被抽象为命名系统的核心能指——或以中华文化传统中的物象寓意锚定人物命运与生存伦理,或通过自然习性与人性特质的直接映射,构建起“物性—人性”的同构系统,或以符号的永恒对抗肉身的速朽,共同指向对长寿的执念与对宿命的无奈妥协。这种命名实践将自然物升华为文化基因,在姓名中完成从“物”到“人”的象征转化。然而,必须承认这种命运隐喻是超故事层的。

(二)民俗之维:实用主义的生存期望

《日光流年》的姓名符号亦深刻体现了民间实用主义的生存策略,其中,这种实用维度的盼望最集中体现为对长寿的追求,共同将“求生”符号传统推向极致:“南山”“高寿”“百年”等一系列具备长寿寄愿的姓名符号的密集使用,构成对三姓村短寿早夭的宿命的符号学反制——当血肉之躯注定速朽,唯有借助符号能指的永恒性,才能在象征层面实现对生命限度的超越。这种命名策略暴露了整个三姓村乃至农耕文明深层的生存焦虑:在不可抗的死亡秩序面前,符号置换成为最后的救赎路径。

(三)命运之网:人物宿命的符号表征

1.个体轨迹:性格的符号显形与命运的象征性预叙

《日光流年》通过姓名符号与人物性格、命运的深度互嵌,建构起个体生命轨迹的象征性书写系统。在性格维度,姓名符号以隐喻机制预设人物行为逻辑,如杜竹翠的辛辣粗粝消解传统文人的“竹”之雅,将精英伦理下沉为乡土生存的原始韧性,又如司马虎与司马鹿的动物符号构成性格两极,“虎”借威权野性投射为司马鹿的暴烈大胆,“鹿”凭柔善意象显影为司马鹿的温和性情,符号对立演化为不同人物个性极端对立的戏剧张力。

在命运维度,姓名能指亦通过语义悖反预叙三姓村人的宿命困境,构成精彩的超故事层隐喻,如杜流之“流”从灵隐渠引水的生存希望(水利救赎)逆转为投巧自尽的死亡闭环(不腐水浮尸),符号意义在叙事中颠倒,又如司马马仁之“仁”与“天地不仁”形成反讽,对抗自杀的救赎路径的溃败使姓名沦为悲剧宿命的注脚,“天赐仁德”的期许与喉堵症的无解性构成荒诞对话。

2.家族图谱:命名逻辑的族群差异

《日光流年》三大家族的命名系统通过差异化符号策略,建构起映射家族特质与生存困境的编码体系:其一,杜氏命名系统以植物意象为核心,形成相对密集的传统文符号矩阵。其命名高度贴合“医道门户”“村中的书香门第”的家族定位,通过植物特性与中华文化传统物象象征的互文,完成“医学世家”“书香世家”的身份自证。其二,司马氏命名系统呈复合型符号结构,其动物符号与民俗符号的交织,形成多层次语义网络。这种与众不同的命名策略,或为司马家族成政治领导力、凝聚力与权力力的符号化外显,或与司马家族在三姓村中的权力地位形成镜像。其三,蓝氏命名系统以数字符码与直陈诉求为主导,起名逻辑最为直接质朴,小农属性与生存焦虑尤为突出。

《日光流年》中个体的挣扎与集体的宿命,最终在姓名符号系统中凝练为乡土社会对死亡、伦理与命运的寓言,构建起乡土文明的认知范式。当三姓村人在喉堵症的阴影下以姓名书写生存宣言时,符号的能指与所指早已化作了三个渺小、落后的农耕社群面对无常命运的集体精神史诗——在语言的永恒性与肉身的速朽性之间,姓名隐喻是三姓村最后的抗争,也是悲酷的挽歌。

三、结语

《日光流年》的姓名符号隐喻系统以其高度理论化的编码逻辑,构建了一个兼具文学深度与文化批判性的象征场域,成为当代文学研究不可忽视的文本实验。从文化批判的维度而言,这一姓名符号系统堪称一部微观的“土”精神史诗——姓名符号不再局限于身份标识的功能,而是演化为一种“超故事层”的叙事装置,以能指(自然意象与民俗符号的双重逻辑)与所指(的复杂博弈,通过符号的集体编码实践,将个体的生存焦虑升华为群体的命运性困境,将人物的性格特质、行为逻辑与命运轨迹深度绑定,使文本呈现出“符号即命运”的寓言性特征。符号系统成为一面镜子,折射出乡土中国在传统与现代、生存与伦理、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多重张力。在姓名书写的瞬间,个体的渺小与命运的宏大、传统的负重与现实的虚无、抗争的激情与宿命的荒诞,皆被熔铸为永恒的姓名图谱。这一系统以符号的诗学本质,完成了对三姓村乃至农耕文明的精神本质的终极叩问与深刻批判。它表明,这种实践提示作家,可通过深耕本土文化符号,使作品在承载地域特色的同时具备普世性的哲学反思。此外,姓名符号的编码逻辑也为当代文学如何平衡现实主义与寓言性提供了范本——在具象的乡土书写中嵌入抽象的符号系统,既保留了叙事的真实性,又赋予文本以形而上的阐释空间。

从文学研究的角度看,本研究突破传统文学批评对叙事结构、主题或风格的单一聚焦,推动了文学批评方法论的多维拓展。通过融合认知语言学、类型学与中国传统物象体系,本研究展示了跨学科视角在文学分析中的有效性,为解读其他作品中的符号隐喻提供了可借鉴的范式。同时,《日光流年》的姓名隐喻研究还成为当代文学理论本土化提供了实践案例。它表明,中国文学批评不必囿于西方理论的直接套用,而可通过激活传统文化资源(物象理论、训诂学)构建独特的阐释框架,这种“在地化”的学术路径,既能避免理论移植中的语境错位,又能重新发掘本土文化的阐释活力,对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具有启示意义。

总之,对《日光流年》姓名符号的隐喻研究不仅是对单一文本的深度解读,更是一场关于文学符号学、文化批评与理论创新的思维实践。它证明了文学研究中“小符号”的“大能量”——通过微观的符号解码,既能抵达文本的深层结构,也能透视社会或时代的精神本质,最终在语言与命运的永恒博弈中,为现当代文学研究开辟更为广阔的阐释疆域。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